

S01496
梁尚勇著

美國高等教育新論

廣文書局印行



014964

G 649.712
883

梁尚勇著

美國高等教育新論

廣文書局印行



S9000646

自序

美國高等教育的發展，自殖民地時代起，迄今逾三百年。察其發展經過，始則模仿英國，繼向德國學習，而終能自成一格，在世界上發生影響與領導作用，實為一自無而有，由有而先實，而光大的過程。其所以能够如此，美國本身有利的客觀因素與自然條件固不無關係，但觀其興革的關鍵，需要的配合，觀念的創新，以及規模的建立，却每能表現美國教育界領導人物的智慧和理想，的確令人欽佩。

筆者任教國立政治大學教育系所，講授比較教育課程，近數年來，即對美國高等教育的發展，特感興趣。自民國五十七年起，筆者曾預備在十年之內，以一年一專題的研究方式，將美國高等教育各方面的問題，作一通盤研究。四、五年來已先後完成五篇論文，分別發表於東方雜誌及國立政治大學學報。本擬待十篇論文寫成後再整理成書出版，惟年前奉派轉任公職，公務忙碌，已不暇再事著述，其餘五篇何日完成，實難預期，遂先將已發表之五篇論文略加整理，成為本書。雖然內容不甚完全，但亦可略觀美國高等教育發展之梗概。

我國高等教育在近十數年來已有蓬勃的發展，尤其在量的方面擴充甚速。去歲新大學法修訂完成，頒佈實施，即在對新的形勢和新的需要謀所配合。惟大學法所能規定者僅在於體制與原則方面，其未能敍及和規定者仍然很多。本書之出，希望能對今後研究我國高等教育之許多實際問題，提供參考。

本書之能出版，應特別感謝廣文書局王董事長道榮兄的協助。在排印期間，承許健夫先生幫忙校對，亦在此一併致謝。

梁尚勇 謹識

民國六十二年元月

美國高等教育新論

目 錄

自序

第一章 美國高等教育的初創與成長	一
第一節 十九世紀以前英國的影響	一
第二節 德國的影響及自己的道路	二
第二章 美國高等教育的哲學背景	七
第一節 心智訓練說	七
第二節 理性的人文主義	十四
第三節 實用的自然主義	二二
第四節 綜合的折衷主義	二七
第三章 美國的大學董事會及其性質	三一
第一節 模仿與創新	三一
第二節 淵源與發展	三三

第三節 職權與性質	四一
第四章 美國的大學校長及其任務	四九
第一節 職位的性質	四五
第二節 出色的校長	五一
第三節 條件與資格	五九
第四節 地位與待遇	六三
第五節 職責與任務	六五
第五章 美國大學的學術自由	七一
第一節 各時期的主流思想力量	七三
第二節 學術自由的輿論	七八
第三節 美國大學教授聯合會	八九
第四節 學術自由與國家安全	九五
第五節 近十年來的三類案件	一〇二
第六章 美國高等教育的特質與發展方向	一一三
第一節 目前的特質	一二三
第二節 今後的發展	一三四

美國高等教育新論

第一章 美國高等教育的初創與成長

第一節 十九世紀以前英國的影響

美國社會文化發展迄今，是一個始則取之於人，繼則自成一格，終則對別人具有重大影響力量的過程。這一過程在教育上表現得最具體而顯著的就是它的高等教育。

自殖民地時代到十九世紀初葉，美國的高等教育多數是英國大學的翻版。哈佛大學設立於一六三六年，是美國最早的大學，設立之初還稱爲學院，其學院章程便是直接抄自英國劍橋大學。因之，當時哈佛的行政組織、課程、管理學生的方法，甚至學院四個年級的名稱（Freshmen, Sophomore, Junior Sophister, senior Sophister）莫不與劍橋相同。甚至在學位的頒授條例中還明白有「一切遵照英國大學之辦法」的字句。（原文爲*Pro modo Academiarum in Anglia* 英文爲 *According to the manner of universities in England*）（註一）由此可以看出，哈佛的創設，教育上一切措施處處模仿劍橋不遺餘力。哈佛以後，在新英格蘭地區所設立的其他學院與大學，又多以哈佛爲模仿的對象，使哈佛成爲早期美國大學的典型。除哈佛外，在殖民地時代成立的其他八所學院與大學中，耶魯

大學 (Yale university) 兼受劍橋大學與牛津大學的影響。威廉瑪麗學院 (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 自一七一九年到一七五七年間聘用的十一位教授中，有八位出身牛津，可見其受牛津影響之深。其餘普林斯頓大學 (Princeton University) 達特茅斯學院 (Dartmouth College)，哥倫比亞大學 (Columbia University 原名 King's College) 羅特加斯大學 (Rutgers University 原名 Queen's College)，布朗大學 (Brown University 原名 The College of Rhode Island) 等皆為英國教會所創辦（雖然，羅特加斯大學後由荷蘭教會改組接管）。殖民地時期之九所大學，唯賓夕文尼亞大學 (Pennsylvania University 原名 The College of Philadelphia) 在創辦時與教會無關，但亦迅為英國聖公會所控制。這些學校都多少模仿哈佛，而以培養教會領袖人才為其教育之目的。

美國獨立後，除私立大學的數字繼續增加外，公立大學亦漸產生。一七八五年喬治亞大學的設立為美國有州立大學之始，接著各州相繼設立州立大學。但無論這些大學之為私立或公立，皆以新英格蘭地區殖民地時代設立的各大學為模仿對象。間接地說，仍然在承受英國大學的影響。

第二節 德國的影響及自己的道路

到十九世紀中葉以後，美國學界發現英國經院式的大學教育內容已不能滿足他們的需要，乃轉在歐陸尋求新的學術指導對象。由於德國自一八七一年帝國建立後，歷俾斯麥時代，學術研究極為發達，尤其是在自然科學與醫學方面在當時實執世界牛耳。於是，德國大學的課程和研究方法遂成為美國

學者興趣的所在，而造成此後約半個世紀德國大學對美國發生影響的開端。這一開端的具體表徵便是大批的美國學生到德國留學。

美國學生到德國留學，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前尚不足二百人，但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後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則總數在一萬人以上。在這些留德學生中，很多後來擔任美國各著名大學的校長，多數並任期甚長，對改造與開創美國的高等教育有極大的貢獻。舉例來說：伊利奧特（Charles W. Eliot）任哈佛大學校長四十年，對於哈佛建立選課制度出力甚多；基爾曼（Daniel C. Gilman）先任加州大學校長三年，繼任約翰霍布金斯大學（John Hopkins University）的首任校長，在位廿六年，霍布金斯大學為美國第一所在德國學術影響下所建立的大學；懷特（Andrew D. White），任康奈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校長十八年；安吉爾（James B. Angell），先任維蒙特大學（University of Vermont）校長五年，繼任密西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校長廿八年；霍爾（Granville Stanley Hall）為首任克拉克大學（Clark University）校長，在位卅一年；白特勒（Nicholas M. Butler）任哥倫比亞大學校長四十三年。此外，弗維爾（William W. Folwell）曾任明尼蘇打大學（University of Minnesota）校長，亞當斯（Charles K. A. Adams）曾任威斯康辛大學（University of Wisconsin）校長，巴納德（F. A. P. Barnard）曾先任密西西比大學（University of Mississippi）校長後為哥倫比亞大學校長（註11）。上述這些學者不但主持大學行政工作，有些本身即為科學家，由教授出身而以學術研究著名，如霍爾為兒童心理學家，巴納德為數學家即是。除這

些人外，還有更多的德國留學生在美國各大學任教，使德國的學術文化對美國的高等教育發生既深入而又普遍的影響。

大批的美國留學生到德國留學，是美國學術研究承受德國影響的開端與一部份，其高潮則為德國學術研究形態的大學——約翰霍布金斯大學的設立。霍布金斯大學是美國真正依照德國傳統所建立的第一所大學。由於約翰霍布金斯大量遺贈的支持及基爾曼卓越的領導，使得這所大學成為美國高等教育在哈佛以外的另一個典型。由於基爾曼對於德國科學研究方法的嚮往，霍布金斯大學首先成立的是研究院而不是大學本部。他所用心的是如何延攬世界上第一流的學者專家前來研究和任教，而不是壯麗堂皇的校舍之建造。他在「大學的創辦」(Launching of a University)一文中寫道：「本大學的光榮應該建立在它所延攬的教師與學者的素質上，而不在這些人的數量上，也不在於為這些人所使用的建築物上。」(Glory of the university should rest upon the character of the teachers and scholars here brought together, and not upon their number, nor upon the buildings constructed for their use)。(註三)這句話充分說明了他對霍布金斯大學的辦學方針。這個方針並一直為以後繼任的校長所遵守，成為一種傳統。

霍布金斯大學的崛起，在美國的學術思想上還代表著一種重要的意義，那就是宗教傳統的理想主義時代已趨沒落，一種由達爾文主義(Darwinism)，經驗主義(Empiricism)，與實用主義(Pragmatism)相揉合的新教育哲學思想代之而起。因此，霍布金斯大學既不屬於任何教派，也不受任何

教派影響，它唯一的宗旨便是追求真理。霍布金斯大學之以此為宗旨在創校時即已深信不疑，觀諸其在創校典禮時邀請當時著名進化論學者赫胥黎（Thomas H. Huxley）為主要演講人，相信絕這不是偶然的事。（註四）

霍布金斯大學對美國學術界真正的貢獻還在於透過它所培養的許多卓越的畢業生。在它的第一批畢業生中，有很多以後成為美國社會各界的領導人物。在這些人中如：羅斯（Josiah Royce）為哲學家，斐機（Walter H. Page）為新聞學家；特納（Frederick J. Turner）為歷史學家；杜威（John Dewey）為哲學家兼教育學家；卡特兒（James M. Cattell）為心理學家；威爾遜（Woodrow Wilson）為政治家；亞當斯（Herbert B. Adams）、斯慕爾（Albion Small）、卡門斯（John R. Commons）、查斯托（Joseph Jastrow）等則均為著名的科學家。其後霍布金斯大學畢業生中更是人才輩出，據卡特兒在一九二六年的統計，在當時美國科學界享有最高地位的一千名傑出科學家中，有一二四三名為霍布金斯出身。（註五）此外，由於霍布金斯大學的推動與倡導，學術性刊物的出版在美國也日漸增加，自一八七八年到一八八一年前後四年間，有關於數學、化學、語言學與生理學等四種全國性的刊物逐年相繼出版，這些是美國高等學術界最早創立的幾種刊物，而都與霍布金斯大學有密切的關係。由此可見霍布金斯大學在十九世紀末葉與二十世紀初葉在美國學術界所佔之重要地位。

美國從殖民地時代起到二十世紀初葉，在高等教育與學術研究方面之深受英、德兩國的影響已如前述。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則由於本身的社會與經濟的發展和需要，再加上前此各州在發展

州立大學過程中所產生的種種新的觀念，使美國的大學在接受並陶鑄了英、德兩國的影響後，建立了自己大學的理想與觀念。這些新的美國式的大學理想與觀念，雖不一定能完全為世界上各國所接受，包括對美國大學有極大影響的英、德兩國在內，但無疑問的，它們已被公認是這個時代大學發展方向的重要指針，完全地或部份地，直接地或間接地影響著世界上各國大學教育的發展。

【註】

註 I..John S. Brubacher, and Willis Rudy, *Higher Education in Transition*,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38) P.3.

註 II..^{參閱} The Columbia Viking Desk Encyclopedia, Second Edition, 對有關各人的簡介。

註 III..Daniel C. Gilman, *Launching of a University*, (New York: Dodd, Mead and Co., 1906) P.41—42.

註 四..Brubacher, op. cit., P.176.

註 五..Ibid., P.179

第二章 美國高等教育的哲學背景

美國高等教育的發展，自殖民地時期傳統古典式的小型學院，到今日科系林立課程無所不包的現代大學，所發生的改變不僅是一種表面量的高度擴充，而是在實質上，教育的哲學理論上已經大有不同。由於表面的許多改變與哲學理論皆有極密切的關係，我們如果要對美國高等教育的發展作一深入的研究，就必需對其哲學理論的演變有所瞭解。美國高等教育的哲學，在早期可謂完全承受歐洲的傳統，及後始慢慢演變出自己所需要的一套理論來。本章的目的即在依各種理論發生的先後，對美國高等教育的哲學背景與演變作一敘述。

第一節 心智訓練說

在十七與十八世紀，社會上的青年士紳或自由公民，其所以到學院唸書大部份以提高個人社會地位與進身學術界為目的。用這種方式加入學術界，在學院裏首先必須研習兩種當時所謂學術的語文——希臘文和拉丁文。在這種情形下，心智的培養和知識的獲取在課程上很難作一明顯的區別。古典的或人文的課程幾乎是在同一個時期進行和完成。然而，到了十九世紀情況便有改變，文雅或通才教育 (liberal education) 的益智與益知二者合一的課程，一直到十八世紀末期仍很少被感到有分離的需要，現在則這種需要不斷加強，以致高等教育的課程面臨到一個新的發展時代。傳統的文雅教育課

程理論已不再被視為當然而無條件予以接受，一項新的，明確的課程理論已有必要適時建立。

對文雅教育課程不滿的表示，開始並非來自一些新的哲學思想，從理論上加以攻擊，而是直接提出了新的課程類型，在實際上建立起新的榜樣。提出這種新類型課程者，主要為新設的學校，如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所創辦的維吉尼亞大學和設於紐約州的阮賽拉工藝學院（Rensselaer Polytechnic Institute）。這兩所學校均建立於十九世紀的三十年代裏，農工技藝的研習在其課程中佔有極重要的地位。（註一）

從教育哲學的觀點來說，這種課程一部份是前世紀啟蒙運動的資產，另一部份則是出於對當時實施文雅教育的一般學院過份重視拉丁文、希臘文、數學等傳統課程的一種反動。這種反動並非是一種創舉，因為在十八世紀中葉，同樣有一種對拉丁文法學校的反動，其結果便是「阿克登米」（Academy）的創設。「阿克登米」是一種專科職業性的學校，課程雖以傳統的語文與數學為基礎，但重點却在測量、航海、簿記等許多實用的課程。

中等與中等以上學校對於技藝科目日益迫切的需要，說明在這兩個階段學校的青年在學習興趣與態度上的改變。由於當時美國正在開發當中，特別是受到工業革命的激勵，各種新的行業勃興，舊有的行業亦由於科學的進步，日趨於技術化。在這種社會環境中，一般青年（及其家長）既渴望充實自己的知識參加國家建設的工作，又限於財力難在中等以上學校多求深造，因而普遍提出設立一種更具實用性質的高等教育機構的要求。因此，在十九世紀中葉，即會有人主張設立一種有特定課程與特定

教育目標的新學院，以一種他們所需要的實用課程來教授青年，不再如一般傳統的學院，專以開設適用於貴族社會的古典文藝課程為務。（註二）

新課程的內容及其教育目標顯然與傳統的通才教育課程不同，對於通才教育在當時的權威性與獨佔性來說，新課程實直接形成一種挑戰。傳統通才教育的支持者，看到情況的緊迫，遂感到對於過去一向認為無可懷疑的通才教育的理論與價值有向世人作一系統說明之必要。領導從事此一說明的文字撰述者，便是由耶魯大學教授所組成的一個委員會。此一委員會於一八二九年所發表的報告書對通才教育的功能有詳盡的說明，實為十九世紀通才教育的理論基礎。

一八二九年耶魯報告書呼籲美國的高等教育界泯除歧見，採取一致的路線。報告書中說：「心智的教育主要有兩點必須把握：心能的訓練與心能的內容。換言之，即要擴展心能並使心能蘊有知識。」（註三）惟就此兩點來說：報告書表示耶魯委員會傾向於認為前者心能訓練較為重要。支持心能訓練的概念的哲學與心理學理論，一如亞里斯多德在二千多年前所說，認為心靈或靈魂乃指一種自我活動的力量，透過記憶、推理、與想像等各種心能予以表現。藉着這些心能的使用，學生的心智力量得到發展，並且可以隨意從某一學習轉移運用到另一學習，或者從一般的學習運用到各項職業生活。因此，耶魯委員會認為讓一位未來的律師去研習化學或讓一位未來的牧師去研習數學，由於心能力量可以遷移的關係，這種教育亦無不可。其後，普林斯頓大學校長，哲學家麥考錫（James McCosh）亦宣稱一個青年除非接受了全部規定的通才課程，他將不可能知悉他到底有些什麼能力。（註四）

至於有人認為通才教育的課程缺乏實用價值，主張通才教育者則以為不然。如威廉學院 (Williams College) 院長霍布金斯 (Mark Hopkins) 在其就職典禮中即曾說過，任何課程都沒有通才教育課程更具有實用的價值，因為一個經過心能訓練的人，其心能力量可向任何一個方向發展運用。(註五) 心能的形式訓練既然如此重要，訓練的內容即必然只能為次要。然而，訓練總須有內容，而可以作為訓練的內容者又如此之多，耶魯委員會遂感到對內容之取捨應作一原則性的說明。該會認為一個青年在大學四年不可能樣樣都學，因此，凡在大學門檻以外可以輕易或有效地學習到的知識，便不應再列入大學的課程。根據此一原則，耶魯委員會實際上將所有專業性知識的學習皆排斥於大學課程之外，包括工、商、農、機械等與人類生活有密切關係的知識與技能在內。耶魯委員會主張欲從事這類職業者應該到工廠、農場、及會計室去學習，從實際工作中求取技術經驗。該委員會之所以將這些職業性知識的研習排斥於大學課程之外，目的在於保留時間，使學生多學習文理方面的科目。這些科目學生在日後繁忙的現實生活中可能一無機會再予學習。在這種情形下，大學雖然不能設置職業專業訓練的課程，但却提供了一種廣泛的理論基礎。在邏輯上說，這種基礎較諸各種職業課程更具有重要性。

在十九世紀，耶魯大學校長波特 (Noah Porter)，與麥考錫一樣同為哲學家。仗其社會地位大力衛護傳統的通才教育課程，以防止各種工藝科目的侵入。波特的論點與四十年前耶魯委員會報告書的主張不同，而與樞機主教紐曼 (Cardinal Newman) 所著「一個大學的觀念」 (Idea of a Univ-

craity) 一文之看法略相近似。(註六)

波特認為通才教育之目的即在其本身而不在其他外在的事物。由於通才教育具有這種本身自足的性質，職業教育則是實現外在目的之工具，只具有外在的價值，故通才教育優於職業教育。通才教育不是一種工具，其功能的表現即在於受教育者本身。它的目的乃在培養一個人的修養與風度，廣博而周密的見解，與公正的品德和判斷能力。其後，事實的表現雖然是學生們對於技藝的課程較對於通才教育的課程更有興趣和熱情，但却仍不足以動搖波特的信心，認為在教育的內在價值上，通才教育高於職業教育。

耶魯委員會與耶大校長波特先後所表示以心能的訓練與心能的充實為教育的目標，說明耶魯大學在十九世紀遵循傳統通才教育的立場。耶大之崇信通才教育，其原因並非如過去希臘文化時代，卑視職業教育，認其不足為自由公民所學習，而是由於耶大受傳統教育的影響甚深，重視發展智能的課程。當時，南部各州或有以奴隸為社會基礎之古希臘民主方式的主張，但整個北部與西部多數州則均具有邊區社會的拓荒精神，對勞工極為崇敬。事實上大學生中來自農工勞動家庭者亦絕非少數。

十九世紀大學所嚴格實施的心智訓練，在當時亦曾遭受攻擊。批評最烈者為麻省理工學院教授艾提金森 (W. P. Atkinson) 與基爾曼 (Daniel C. Gilman) 兩人，後者不久後便出任為約翰霍布金斯大學的首任校長。這兩人並非不同意心智訓練的基本重要性，但對於過份迷信這種訓練的價值則認

美國高等教育新論

一一一

爲不可。耶魯委員會一八二八年的報告書主張心智訓練應爲大學教育的主要目標，亦並不忽視提供適當的內容以充實心智。惟亦有人對心智訓練極端崇拜，講求純粹的形式訓練，以致完全不顧教材的內容。對於這種看法，基爾曼曾於南北戰爭後不久，代表耶魯的謝非德科學院董事會（The Board of the Sheffield Scientific School）發表一項教育原則性的主張，表示異議。（註七）艾提金森則與基爾曼持相同的態度，反對機械的形式訓練理論，認爲這種理論過份注重訓練的形式，而忽略教材的內容價值。同時，這種理論主張形式訓練的效用乃以其對學生所引起的憎惡和反抗的程度高低爲準亦有未當。

在談到心智訓練所忽視的一面——訓練的教材和內容時，基爾曼與艾提金森承認形式訓練傳統所採用的古典語文具有倫理和美育的價值，但更強調科學與現代語文亦具有同樣的價值，因而不能再予忽視。基爾曼又指出這些新的科目不能因其有實用的價值便應加以卑視。艾提金森除完全同意基爾曼的看法外，並進一步解釋這種貶抑實用學科的態度，乃淵源於殖民地時代從外國帶來的貴族教育制度作風。因此，這種看重通才而漠視勞工的教育形態，若任其長久持續，將有害於美國共和體制的發展。過去的觀念認爲通才教育乃是少數統治者的教育，如今徒然只能招惹反感，因爲當時男性普選權的行使，在實質上已使美國每一公民成爲其自己的主人。艾提金森則一直爲泯除通才教育與實用教育間的鴻溝而努力。他並主張設立一種普遍統一的學校系統，在這種學校系統中，每個人，無論男女，皆能享受一種自由人的教育。